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传播:价值与问题

——基于科学传播视角的反思

翟杰全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余年来传播历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进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之一,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当代社会传播语境下,如果由此就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简单化为科学的传播,将灌输论简化为灌输方法,并相信这种科学性能保证受众自然接受,就会在理念上、认识上、实践中犯简单化的错误。面对当代思想文化和传播环境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需要在理念、理论和实践上全面创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传播; 科学性; 价值与问题; 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6)01-0163-06

关于科学传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 1967)^[1],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科学传播强调面向社会公众传播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2]。马克思主义传播原本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在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被视为包含丰富理论和方法内容的科学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置于广义科学传播框架内进行分析,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相关问题,当代科学传播研究对解决科学与公众关系遇到的问题(如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等)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一些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传播: 历史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种科学揭示自然世界和社会历史规律的新思想,给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提供一种科学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并引导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上半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是因为它内在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西方世界和西方传统的外来思想学说,能够在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广泛传播并最终被中国人民接受,背后当然涉及诸多复杂原因,例如中国近代以来变革社会的强烈诉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在许多方面相通相近、中国20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的促进等,但根本的原因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任何思想学说的传播乃至某种观点的流传都有相应的社会原因,适应某种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或观点,更容易得到传播和扩散。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外患”又加剧了社会“内忧”,引发了社会各阶层要求变革的强烈诉求,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力主通过变法推进政治改良,最后到孙中山领导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先进分子在多个社会层面上做过积极尝试,变革呼声也逐渐触及社会的制度变革。正是在当时向西方寻求新思想和新启示成为潮流、诸多尝试的失败指向社会制度变革的背景下,作为一种革命性思想的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被引入国内。

在将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国内

收稿日期: 2015-1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机制创新及传播体系构建研究”(13BKS101)

作者简介: 翟杰全(1964—),男,教授,E-mail: zhajiequan@bit.edu.cn

的最初阶段,知识分子只不过是让国人了解这种在西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而已,即使到后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只不过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改造中国有借鉴价值的备选理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被引入国内的西方学说,被引入中国的思想学说甚至还包括了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国人也提出了改良、西化、革命等各种主张。但在遭遇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在激烈的争论和比较各种思想学说之后,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渐渐从各种思想学说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先进分子的思想选择。马克思主义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满足了人们获得革命理论指导的需求,这为它被广泛传播并被接受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在许多方面的相通相近之处,则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心理文化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世界、源于西方思想传统,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思想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是相通相近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中国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传统具有某种一致性,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想也容易引起拥有大同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的重民思想有相通之处,中国人从中国历史朝代更迭中获得的经验思维也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学说比较容易认同,等等。

但上述这些因素只是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被接受提供了社会和心理文化基础,科学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广泛传播并被接受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和体系科学,显然很难能有像今天这样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但相比于当时引进的其他学说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分析与阐述、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与解释显然具有更高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在当时开始盛行科学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在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那种空洞的所谓公理正义的背景下,对许多人来说显然拥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这种科学性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并被接受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也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俄国革命、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最初的思想倾向是指向全面引进西方文明的,新文化运动通过推扬科学而使当时的知识界形成了崇尚科学

的文化氛围。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从哲学理论到历史规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宏大的理论体系和完整论证,对当时急欲寻求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变革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这种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就没有多少科学根据的主张或学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又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李大钊就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获得了鼓舞和启发,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上,历史性的转折始于五四运动。而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屈从于西方列强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点燃了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心中变革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而积聚起来的不满,随后便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思想进程,让许多知识分子由原来崇尚西方“公理”转向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开始认真地将俄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的未来联系起来。新文化运动、俄国革命、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的形成,也最终促使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传播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能赢得那么多先进分子的关注和青睐,并最终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理想和信仰,其原因尽管是复杂的,但“科学性”要素在其中显然扮演了重要而关键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论证,契合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变革社会的强烈诉求,并从理论上给这种诉求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论证,从实践上给实现这种诉求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和对未来社会理想的论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这种“科学性”和当时崇尚科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最终被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传播: 可能的问题

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带上了鲜明的“科学”传播烙印,“科学性”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教育中最受重视的因素之一,相信强化“科学性”能够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通过“科学性”论证能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列宁就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对

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3]。邓小平也认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在中国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科学^{[5]17-20};马克思主义传播既是意识形态传播,也是科学的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宣传教育中,我们也历来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其“绪论”中就从多个方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彻底的科学性、坚定的革命性和自觉的实践性,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绪论”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表现^[6]。

因此,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正确性的理论体系,是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科学图景和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同于通常的意识形态传播,既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又以科学性为基础,拥有“科学”传播的特征。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科学性能够提高马克思主义说服力,凸现这种科学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应采用的重要策略。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人们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接受,并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简化为“科学”的传播,很可能在理念上、认识上、实践上犯简单化的错误。

20世纪以来的世界科学发展以及科学传播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纯科学的理论和得到严格证明的科学结论,也未必能够天然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接受。20世纪上半叶之前,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及其展现的美好前景,曾让公众充满无限憧憬,对科学充满敬仰和敬意。但进入20世纪下半叶,先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环境污染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和广泛的担忧,后是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引发激烈的社会争议,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由此发生重要变化,科学技术失去了公众原有的那种敬仰、信赖和支持,甚至在90年代时某些科技发达国家出现了对科学的“信任危机”^[7]。

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当然

源于复杂的原因。随着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带来越来越多让人担忧的问题,公众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也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完美,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有时也会带来危险甚至是害处。科学因其科学性、正确性而在科技决策和科学传播中对公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科学传播学者就通过对传统科普工作的反思,认为传统科普工作中流行着一些“有问题”的认识和理念,正是这些认识和理念降低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接受。这些“有问题”的认识和理念后来被学者们概括成了“缺失模型”(The deficit model)。

“缺失模型”认为科学(知识)对公众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但公众缺乏科学知识,因而公众需要掌握科学,科学需要向公众普及。从一般意义上说,认为公众缺乏科学知识、需要对公众进行科普,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缺失模型背后的假设和预设,例如,认为只有科学才是正确的和有效的,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可靠真理;公众缺乏科学知识导致他们疏远甚至怀疑科学,向公众普及更多科学知识就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接受、信任和支持科学等。这样的认识和理念显然很容易让人们在认识上将科学的“信任危机”简单化地归结为“公众对科学的无知和不理解”,在实践上将居高临下的灌输视为理所当然。

而且缺失模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忽视了公众接受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以及“情景”因素对传播过程的复杂影响。传播学早就认识到,公众在接收信息传播过程中并不像等待信息注入的“空瓶子”,他们如何理解、有何看法、是否接受接收到的信息,会受到他们认知框架、生活经验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也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而是会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解释这些信息,信息的来源、传播者的态度、传播的方式以及受众过往的生活境遇、团体成员身份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信息的理解与接受。传播学因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抛弃了“枪弹论”这类认为宣传和传播可以让受众像被射击的靶子一样无法抵抗、过分夸大宣传和传播效果的效果理论。

真正和纯粹的科学尚且会遇到诸如信任危机这类问题,对拥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思想学说的传播而言,我们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因为它是科学,所以人们就会接受”。特别是在科学主义思潮已经不可逆转地衰退的当代,任何理论或学说都很难单凭其科学性而赢得人们的接受。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同样也存在一个类似

的模型,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灌输模型”,这一模型包含这样一些假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人们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困惑,才会接受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只要人们科学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人们就会自然接受,就能够提高思想认识;通过全面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人们就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抵御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社会思想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由此得到解决;等。

这个“灌输模型”实际上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简单化理解(或者说误解)、并将灌输原则简单化为灌输方式方法的结果。“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到过灌输的观点,考茨基最早提出灌输论^[8],列宁对灌输论进行过系统阐述。灌输论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让工人阶级得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列宁从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关系出发提出的灌输论无疑是正确的,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要坚持灌输原则。但灌输论强调的是工人运动需要接受并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并没有强调要用“灌输”的方式方法进行灌输,灌输论与灌输式、灌输原则与灌输方式在这里显然是有重大区别的。

灌输论可以在认识论层面上给灌输原则和灌输关系提供合理性根据,但并没有给操作层面的灌输方式方法提供正当性理由。灌输论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无法产生系统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需要从外部加以灌输,需要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但并不等于必须采用灌输式的教育手段,甚至是强制的或“填鸭式”灌输。对灌输论和灌输原则简单化和片面化理解,将灌输原则简单化和方法化,甚至简化为居高临下的、“填鸭式”或“注入式”生硬灌输,在认识层面会误解、在实践层面会扭曲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仅在理论上错误,而且在实践上有害,会极大地妨碍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传播的实际效果。

联系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教育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视,我们可以将“灌输模型”视为“缺失模型”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一个具体体现,它们背后的传播理论模型都是传播学中的“枪弹论”。现代传播学认为任何传播过程都处于复杂的传播情景中,传播效果受复杂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思想学说的传播中,影响受众接受与否的因素尤为复杂,特别是转

型期内的社会背景变化因素群、社会情绪心理因素群、公众认知因素群、传播内容因素群等各种因素,都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及公众接受产生复杂影响。例如在经历多次过度政治化的思想斗争、阶级斗争教训之后,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某种传播策略,任何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即使这种观点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理由)都有可能让人联想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意识形态传播是典型的复杂传播现象,将意识形态内容科学化的努力以及对理想信念的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价值性的论证,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和认识,但并不能完全保证让社会成员能够认同和接受,更不能保证转化为他们的信仰和行动。在目前中国社会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要面对公众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现实问题的心理感知等复杂因素,还会与公众对各种政策内容的解读乃至对政府官员形象的感知等复杂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因某些特定社会事件而产生的各种非理性的情绪都会影响到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认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整体效果。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复杂性。

三、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科学性” 基础上的策略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充分利用并发挥科学性要素的作用,通过科学性论证促进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认识。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受众就能够、就应该接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精英当然也不能自视为真理的化身,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公众进行真理灌输。在充分利用和发挥科学性要素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同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意识形态传播及其效果依赖于意识形态内容能否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寄托和理想诉求,能否激发社会成员的价值共鸣和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通过满足利益诉求、提供精神寄托、产生价值共鸣、形成情感认同来获得传播的实效^[9]。

在我国早已实现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之后,我们不能再简单化地以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区分社会成员的思想标准,也不能再以简单化的斗争手段对待各种异己的思想学说,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马克思主义

教育与传播,需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下,讲究传播策略的运用,利用更柔性化的教化手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得到广泛认同,使马克思主义主张和理想赢得更多共鸣,引领社会思潮,增进思想共识,建立“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机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需要在理念、理论和实践上全面创新,在继续发挥“科学性”要素作用的基础上推进传播策略的创新。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机制的变革,当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特征,社会也越来越进入“平民化”的发展状态,人们的理想追求、价值标准、生活态度、生活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甚至相当多的公众在思想意识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去政治化”倾向,政治意识淡漠,更关心实际利益;生活方式上更趋平民化和世俗化,有了更多务实和世俗的风格,甚至部分公众对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得比较拒斥。社会的转型和机制的变革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也使社会思想变得更加活跃,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彰显所谓思想独立和批判现实的观点也因而受到更多人的推崇。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呈现出活跃化、多元化的复杂特征。

另一方面,当代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和互联网普及提供的开放平台,在促进思想文化领域开放和多元、促进思想观念解放和进步的同时,也为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和更大的空间,特别是为某些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学说、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渗透以及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学说、标榜反主流思想观点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方便途径,甚至使各种落后消极的思想观念和错误思潮在某些范围内流传和泛滥,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性和复杂化,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带来严峻挑战,使马克思主义传播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形势和挑战。

面对这样的复杂背景和环境,简单化、粗放型、缺乏传播策略意识和精细化操作的传播实践,都难以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居高临下的生硬灌输和空洞说教、脱离实际的照本宣科和坐而论道以及充满战斗风格、思想斗争导向、过于政治化的传播,甚至会直接降低传播的效果。事实上,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有过过度政治化的教训(如文革期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教育工作中把灌输原则简单化为灌输方法的做法也带来了许

多消极影响,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带有单向灌输、正面宣传、宏大道理、官方话语特点的宣传方式和宣传模式,已经脱离了时代特征,既不符合当代的传播理念,也不具有受众喜好的传播风格,甚至会让部分受众对这种宣传和传播敬而远之。

因此,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需要在全面分析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传播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和接受机制的基础上,破除对“灌输论”的简单化理解,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传播策略。特别是需要在当代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建立适应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新认识、新理论和新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牢牢置于科学性的基础之上”^{[5]17-20},探寻适应社会思想多样、价值多元、思潮多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系统策略,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中,需要有更加民主开放的态度、交流对话的方式,使用更加柔性的策略和手段,更加契合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和接受习惯,实现平民化的转向^[10],坚持平民化导向和平民化风格,有平民化姿态和平民化作风,更加注重传播方式的亲民性、传播文本的亲民性、传播语言的亲民性,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考虑利用“嵌入”模式和策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有机融合到国民教育和社会生活,积极探索和尝试启发式、讨论式、疏导式、说理式等方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能对受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产生更为实际的影响。

基于对传统科普中缺失模型的分析 and 反思,当代科学传播提出了民主模型、参与模型、对话模型等新理念和新理论,强调要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建立平等交流、公众参与、协商对话的机制^[11]。在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领域,同样需要建设这种双向交流、平等对话的关系和机制,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搭建思想交流对话的平台,在交流讨论、辩论交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进而寻求更多的共同价值认知,谋求最大的思想共识,创造和谐共进的思想文化氛围。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应拒绝那种刻意彰显对立、过于政治化的传播风格,通过平心静气的说理和充满善意的引导,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和理想信念走进更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成为他们内在的思想认知和理想追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随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需要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面对当代社会环境、思想文化、传播生态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公众思想独立意识日趋增强、社会思想活动日益活跃、社会文化环境日渐开放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传播需要改变原有的某些传统理念和习惯做法,在继续发挥科学性要素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当代任务

进行系统思考,并根据时代背景变化和要求,确立新的认识 and 理念,探寻内在的机理和规律,探索有效的方式和策略,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理念、理论和实践创新。这已经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紧迫的战略任务和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 [1] Bernal J 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M]. First 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67:292-308.
- [2] 任福君,翟杰全. 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75.
- [3]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3.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 [5] 徐艳玲,李建柱. 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初探[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6):17-20.
-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19.
- [7]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 科学与社会[M]. 张卜天,张东林,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
- [8] 王学东. 略谈考茨基“灌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J]. 国际共运史研究,1988(2):123-126.
- [9] 朱兆中. 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4):12-21.
- [10] 翟杰全. 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需要平民化转向[N]. 学习时报,2011-04-25.
- [11] Bruce Lewenstein. Model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B/OL]. (2003) [2015-08]. Version:16 June 2003, http://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view_op=view_citation&hl=en&user=XhxYfngAAAAJ&cstart=40&sortby=update&citation_for_view=XhxYfngAAAAJ:YsMSGLbci4C.

The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as Science

—Values and Problems

ZHAI Jiequa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in China, “scientific”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culture of China, Marxism is also considered a kind of science with rich contents and metho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cientific factors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but if we will thus simplify the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as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believe that the “scientific” theory can ensure the audiences to accept naturally, then we will make mistakes of oversimplification in the ide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Faced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social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Marxism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eeds a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idea,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Marxism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factors; the value and the problem; science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孟青]